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与影子教育选择

——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分析视角

陈 涛 巩阅瑄 李 丁

（西南财经大学 发展研究院，成都 611130）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成都 611130）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成都 611130）

摘 要 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源自家庭教育需求，这一需求不仅受制于多重“硬性”的家庭资本，还受控于“软性”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家庭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得以建构和传递，并且深刻影响着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 年数据，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了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权力距离越大，意味着公平感越强，家庭越希望通过加大影子教育投入，以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不确定性规避越低，意味着家庭越偏好风险，家庭期望增加影子教育支出获得“高风险”带来的“高回报”；家庭集体主义感越强，其从众心理越强，对影子教育的需求也越大；家庭短期导向越强，意味着越看重当下，影子教育的高效和补充特性恰恰迎合了家庭所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影子教育投入是否具有特殊性，研究发现相较“投己”，家庭文化价值观更倾向于“投子”；相较“择校”，其更倾向于“择教”。本文还考察了影子教育类型是否存在差异性，研究发现“学科类”和“艺体类”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作用下呈现较大反差。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面对家庭微观教育决策失灵，需引入家庭“元治理”，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不断调和家庭文化价值观，从而做到理性选择影子教育。

关键词 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影子教育；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家庭元治理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9)03-0164-23

DOI：10.12088/pku1671-9468.201903009

作者简介：陈涛，男，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巩阅瑄，女，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李丁，男，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GL041）。

致谢：感谢香港大学马克·贝磊（Nlark Bray）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胡咏梅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薛海平教授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　　言

中国社会历来有“重教”的传统，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国家机器”，“学而优则仕”也成为古代学子出人头地的价值追求。然而，作为精英教育正途的科举制，其背后是对应试者家庭的选拔。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科举制的社会开放程度产生了质疑，研究发现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受益者不过约三百个大家族。[1] 显然，家庭背景及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精英塑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对其幼童塾师、蒙书及学校的选择也变得至关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家庭、家族而言，国家的政治性选拔蜕变成了地方社会集团身份、地位等再生产的工具。”[2] 这恰恰印证了布迪厄(P. Bourdieu)著名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他认为获得文化资本的首要方式是“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幼年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3] 无疑，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场所，在科举制度与家庭教育的强关系链与相互浸染中，建构了特有的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这一观念如同“基因”一般历经世代相传深刻影响着我国当代家庭微观教育决策。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已经深深植根于千家万户的教育观念中，高考制度在现代社会的精英选拔中继承了古代科举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特征，[4] 向上流动的焦虑情绪开始“下移”，“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成为家庭微观教育决策的共识，特别是当学校教育系统无法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时，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课外补习市场在中国迅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中国教育新业态。2016 年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4 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8000 亿元，参加辅导的学生高达 1.37 亿人次，占在校学生总量的 36.7%，且这一比例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达 70%；[5] 2017 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规模均处在较高水平，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 8143 元，其中小学阶段校外支出的比例最高，达到 38.3%。[6] 显然，课外补习市场的兴起源自家庭对教育选择的需求，这些增长数据勾勒出一幅文凭社会的当代图景。

本文并不遵循经济、制度等“宏大叙事”的传统研究范式，而从微观场景考察家庭文化价值观——文化的核心认知——是否对其子女影子教育选择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当家庭总体性文化资本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制度影响仍是一个“黑箱”的前提下，探究家庭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机理，或许有助于找到打开“黑箱”的钥匙。[7] 本文会进一步探析家庭选择影子教育行为的“合理性”，进而为我国影子教育需求问题及治理提出相应的策略路向。

二、文 献 综 述

“影子教育”概念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是德席尔瓦（W. A. De Silva）、玛丽姆都（T. Marimuthu）以及斯蒂文森（D. L. Stevenson）和贝克（D. P. Baker）等分别在考察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课外辅导教育时的形象比喻。[8-10] 1999 年马克·贝磊（M. Bray）以此为题[11]，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相关研究报告后，影响教育逐渐受到国际学界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概括来说，影子教育恰如其名，与主流学校教育如影随形，因学校教育规模、形态和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其特征主要体现为私有性（private）、补充性（supplementary）和补习（tutoring）。[12]近 20 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主要聚焦三大问题域：一是谁需要影子教育（需求问题）；二是影子教育效果如何（质量问题）；三是影子教育是否扩大了教育不公（公平问题）。[13]本文的研究内容属于第一个问题域，即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常常来自长辈（主要是父母）的微观决策，而这一决策又受多层面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1）贝克对参与 TIMSS 测试的全球 41 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和毛入学率越低，越多家庭选择影子教育；[14]这一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更为突出，如非洲国家的家长认为课外补习能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15]翁秋怡认为，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私人课外补习的供给和需求都会增多。[16]（2）拥有选拔性考试制度的国家成为影子教育最集中的区域。澎湃认为，儒家文化盛行之地的社会压力因高风险考试制度而增加，参加课外补习是为进入高等教育深造做准备。[17]在中国大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教育供给与需求的主要矛盾已从上大学难变为上好大学难，[18]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竞争促使家庭通过选择影子教育增强其子女的“筛选优势”和人力资本。（3）斯蒂文森和贝克、贝磊、萨里里（F. Salili）和金（K. Kim）等研究者认为，影子教育之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更盛行，与儒家文化中“强调努力”和“注重学习”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19-22]奥里尼（J. Aurini）等则认为，北美、大洋洲和西欧的主流文化都强调能力而非努力，尽管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但这一主流文化并未减弱。[23]

正如贝磊所说，微观层面的课外补习差异可以从宏观文化和经济结构分析中找到更具解释力的答案。[24]这一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微观层面原因。在现有研究中，家庭背景或环境成为选择影子教育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李春玲、蒋国河和闫广芬、薛海平等的多项研究在科尔曼（J. S. Coleman）和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家庭资本”概念，[25-27]并将其作为考察家庭背景的重要内容。家庭资本包括四个方面：社会资本，指向家庭成员内部亲子关系和外部的人际关系；文化资本，通常指向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资本，指

向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政治资本，通常指向父母的职业背景。[28]从这一角度看，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围绕“资本”展开，如：贝磊在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辅导的调查中发现，兄弟姐妹数对补习支出有负面影响，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家庭，其补习支出越少；[29]坦塞尔（A. Tansel）、薛海平和丁小浩、西洛瓦（Iveta Silova）等研究者发现，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经济收入及城乡差异等对影子教育选择均有显著影响。[30-32]显然，已有研究基本属于“资本”范畴的考量，是从有形层面解构影子教育的问题域，即便是文化维度也多指狭义的家庭文化资本，较少关注家庭文化价值观这一无形的核心层面。

在现有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关注家庭文化价值观对教育投入的影响。譬如：刘洁和陈宝峰将农村家庭价值观分为教育人文观、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从众倾向等七个维度，实证研究发现这些文化维度均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教育投资产生影响；[33]古德曼（A. Goodman）等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影响子女的成绩，主要是因为父母提高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34]余甜丽和詹宇波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验证了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即家庭的教育支出会受到社区等其他家庭文化的传播影响；[35]丁从明等考察宗族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问题，发现宗族文化中对“香火”延续的认知会使家庭更倾向对男性进行教育投资；[36]汉纳姆（E. Hannum）也指出，在“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家庭提高对男孩的教育投资可视为一种保障。[37]由此看来，家庭文化价值观对教育投入的选择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家庭资本以外的“软”因素，如：从众心理、教育期望、“重男轻女”等文化价值观，这些内外交织的文化因素构成了影子教育选择行为研究的新视角。

然而，现有文献中缺乏关于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这一具体问题域的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只是选择了与文化价值观有关的单维因素，检验其与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研究影子教育需求的新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引入考察文化价值观的相关理论，系统地考察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从而找到家庭选择影子教育行为中产生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由于家庭文化价值观的高度抽象化及其关联的复杂性，难以借助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计量方式进行直接量化分析。因此，本文引入了当代荷兰著名管理学、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在其著作《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 of Mind*）中阐述的“文化的五个分析维度”（简称“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即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Long-term Oriented or Short-term Oriented)以及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or Femininity)。[38]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共同心理程序,这一程序形成某一地区人们以某种特殊方式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心理定势。”[39]尽管他声称文化研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才有意义,但很多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 25 年里,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比国家和社会层面还要多;[40]亦有研究者指出,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在国家层面的划分与个体层面具有统一性。[41]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共享价值观体系,可以说价值观是文化的基石。[42]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为相关文化研究创建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并得到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广泛认可。如:国内学者占德干、张炳林通过借鉴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探讨了中国企业文化的构成与差异;[43]美国、荷兰两国学者詹森(E. P. Jansen)等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发现文化环境对企业的报酬激励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4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框架在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行为、决策、态度、动机等企业和个人微观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有研究甚至认为该理论在组织和个人层次的分析更加合理。[45]然而,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廖梦帆从权力距离维度分析了中美学生选择与老师交流媒体的差异;[46]吴薇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分析了中荷两国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的跨文化差异。[47]显然,该理论框架具有较好的跨文化解释优势。还有研究指出,在中国地域内同样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48]此外,该理论自身构建过程中的“长期/短期导向”维度,恰源自“中国文化联结”研究团队对儒家工作动力考察的结果。[49]因此,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不仅其本身具有“中国印记”,而且在“本土契合性”认识的影响下,港台学者在理论的文化适应性方面亦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杨国枢、郑伯埙等认为中国人(华人)社会认知中具有典型的家族(家庭)取向,[50-51]因此将该理论置于家庭组织环境中考察教育决策问题,无疑更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现实需要。如:强铭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比较中美家庭教育模式的差异。[52]综上所述,本文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为理论分析框架,选择前四个维度考察我国家庭文化价值观是否对影子教育选择产生影响。① 具体维度包括四项:

第一,权力距离。霍夫斯泰德指出,在一个社会中,组织或机构中的弱势成员对权力分配存在不均等的接受程度,[53]权力距离的大小可以反映出不同文化集体对不平等问题的态度,即社会公平感,公平感越强,其权力距离越大。段锦云等认为,公平感强的人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倾向,员工对组织的公平感强会显著增加进谏行为,更好地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54]然而,相较高公平感的

①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可以根据研究所需进行维度选择,本文因不涉及男性和女性研究,故只选择前四个维度。

“激励”影响，不公平感往往带来反作用。翁定军认为不公平感强的人会更容易产生“偏狭”以及“嫌富怜贫”的阶层意识。[55]夏向东、熊青认为社会不公感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56-57]朱志玲等认为不公平感甚至导致对社会的怨恨情绪。[58]许多微观研究表明，学习焦虑不但没有带来积极影响，反而极易引起学习倦怠、动力不足等消极结果。[59-61]由此看来，公平感低的家庭，由于不公导致各种消极影响，这与人们对越不公越努力的经验判断相背离。因此，影子教育作为主流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同样有提升人力资本的功能，而且公平感越强的家庭在课外补习的投入也越高，这一价值观作为持续性感受会影响家庭微观教育决策。

第二，不确定性规避。霍夫斯泰德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对不确定性认识的态度不同，[62]为此他提出这一概念，指代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背景的威胁程度。[63]影子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特别是不同于义务教育，其收费高、周期短、功利性强且市场化程度高，这意味着影子教育投入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性，而考试选拔机制又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些使得影子教育回报结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尽管有学者指出，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经成为家庭生活必需品。① 但事实上，“必需品”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显示，城镇地区兴趣拓展课外补习参与率为 29%，而农村地区仅有 5.4%；课外补习地区差异巨大，东北地区年生均支出高达 4357 元，而西部地区仅有 1806 元；家庭年消费水平在前 25%的年生均课外补习为 8824 元，是后 25%家庭的 6 倍。[64]如此看来，人们需要对当前我国影子教育市场发展有一个全面评价。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影子教育投入仍然一项具有“高风险性”的选择行为，特别是一些家庭认为“只有高风险，才有高回报”，这一“投资”观念决定了高风险偏好的家庭会提高对影子教育的投入，以期获得较高的回报(如：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这说明家庭对影子教育投入的不确定性规避相对较低。

第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霍夫斯泰德看来，个体和集体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一个维度连续体的两极。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如个人主义社会强调个人中心，而集体主义社会突出集体目标。[65]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家庭”为参照单位，其外部环境俨然一个“大集体”，包括亲朋好友同事等社会网络关系，集体主义社会往往会通过从众心理，使个体呈现出特定行动。如：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大众压力下，从众心理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课外补习的投入也会相应增加。

第四，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霍夫斯泰德认为，长期和短期导向可以反映人们的时间偏好观念。长期导向是指一种重视未来收益的倾向，如注重储蓄和

① 西南财经大学贾男教授认为校外教育补习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参见：课外补习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成为生活必需品？载《中国青年报》2017 年 3 月 20 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7-03/20/content_28617051_2.htm。

投资，将节俭和毅力视为美德；短期导向则注重过去和现在，如及时行乐和消费。[66]吴薇根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的原理，对教育现象展开解释。如：长期导向意味着教育需要坚持不懈，短期导向表现为教育追求短、平、快的结果。[67]从人才培养规律来看，学校教育投入收益往往是长期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至少需要 15 年时间。孙伦轩等把学校教育视为“公共理性”，而把课外补习市场看作“经济理性”，追求效率和利润。在市场逻辑的影响下，不少家庭把课外补习作为其子女向上流动的“快车道”。[68]孙海峰甚至指出，正规校外培训机构在短期内提升学生学业成绩是可能的，但从长远上看，却没有太大意义。[69]因此，笔者认为影子教育，特别在基础教育阶段，其本质属于“私教”行为，且很难具有连续性，父母希望投入后能立见成效。当然，对这一“投入”的认识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人力资本本身就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本文更多从影子教育收益的即时性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具有短期导向价值观的家庭更倾向影子教育投入。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权力距离越大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 2：不确定性规避越低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 3：集体主义感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越高。

假设 4：短期导向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影子教育投入较高。

四、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的实证部分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 年的全国抽样数据。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查收集了来自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63 个县，1439 个村（居）委会，共计近 37000 户家庭、120000 余人的数据。主要内容包括：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就业状况、家庭的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以及各类主观认知评判等。数据具有国家级、省级和副省级代表性，全面详细地反映中国家庭金融状况，并且针对不同的家庭基本特征匹配相关题目，数据内容丰富，涵盖领域全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受访者之间建立了长期而相对稳定的关系，这为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变量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对其子女在中小学阶段进行课外补习的总支出，这里的课外补习包括学科类补习和艺术、体育类补习。核心解释变量为霍夫斯泰德四个文化维度延伸出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公平感、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从众心理。（见表 1）

公平感对应权力距离维度，旨在考察受访者对现实社会公平程度的认知度。笔者把该变量处理为虚拟变量，把“非常公平”和“比较公平”赋值为 1，将“一般”“比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赋值为 0。由于“社会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持有“社会更公平”态度的人，说明他们对“不公平”的接受程度会越高，这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大的权力距离，相信教育的主观努力会改变现状。

风险偏好对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对投资意愿的风险接受度。为便于研究，笔者同样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把投资意愿为“高风险”与“略高风险”的受访者赋值为 1，把投资意愿为“平均风险”“略低风险”和“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受访者赋值为 0。衡量风险偏好程度可以反映出人们对待“投入—回报”问题的态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们的教育消费心理及整体状况。

从众心理对应集体/个体主义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外部环境对个体/群体选择的影响程度，从众心理可以反映“集体主义”式的家庭文化价值观。笔者对家庭从众心理考察是基于个人购买股票在很大程度上受周围人的影响这一事实来反映，[①]同样将其设为虚拟变量。

时间偏好对应长期/短期导向维度，旨在考察家庭对“投入—回报”问题在时间维度的选择取向。本文采取信用卡使用额度来衡量时间偏好。这是因为信用卡的使用情况与时间偏好存在密切关联。信用卡消费的特点是先消费后还款，即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点消费的收益成本的比较，是测度时间偏好的典型变量。[70]弗雷德里克(G. L. Frederick)认为信用卡欠款或透支均可作为衡量传统贴现率的最佳指标。[71]迈耶(S. Meier)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具有当下偏好的人有更多信用卡借款，且信用卡的数量也显著增加。[72]因此，信用额度越高，说明时间偏好越强，越倾向及时消费，即为短期导向的文化价值观。

表 1　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课外补习支出	家庭子女就读中小学期间的课外补习费用。其中，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权力距离(公平感)	虚拟变量。社会公平感设为五个等级，认为“非常公平”和“比较公平”的两个等级赋值为 1，“一般”“比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三个等级赋值为 0。公平感越高表示权力距离越大。

① 在心理学中，从众心理的测度包涵信息性、规范性以及价值表达影响三个维度。每种维度通过多个问题综合评判。本文使用机构调查数据难以覆盖全面，另外股票与影子教育均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高收入阶层选择性及投资性质，通过股票的从众行为可作为反映家庭从众心理的变量。参见：李东，张耘堂，唐桂：《消费者知识、从众心理与来源国效应的关系研究》，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第 138—144 页。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
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	虚拟变量。教育投入的风险偏好设为五个等级。认为“高风险”“较高风险”的两个等级赋值为 1，“平均风险”“较低风险”和“不愿承担风险”的三个等级赋值为 0。风险偏好越高表示不确定性规避越弱。
个人与集体主义（从众心理）	通过选取个人买股票是否受周围人影响来反映家庭的从众心理，该问题有五个等级的选项，将其设为虚拟变量。越受人影响的前两个等级赋值为 1，其他三个等级赋值为 0。
长期与短期导向（时间偏好）	选取信用卡使用额度的对数形式衡量家庭的时间偏好。信用额度越高说明时间偏好越强，倾向于立时消费，即短期导向。
家庭变量	
收入	家庭总收入
父母受教育年限	课外补习子女的父母学历，即受教育年限。按最终学历对应的受教育年限推算，即 0 年（未上学）、6 年（小学）、9 年（初中）、12 年（高中）、15 年（专科）、16 年（本科）、19 年（硕士）及 22 年（博士）。
家庭儿童数	家庭 6～15 岁儿童数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依赖率	家庭成员中没有工作的人数与家庭总人数之比，反映家庭负担状况。
户主女性	户主为女性设为 1，男性设为 0。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
经济变量	
农村	农村设为 1，城镇设为 0。
东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东部地区设为 1，其他地区设为 0。
中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中部地区设为 1，其他地区设为 0。
西部	受访者所在地为西部地区设为 1，其他地区设为 0。
县级 GDP	2015 年区县级人均 GDP 并取对数形式。
学校变量	
重点学校	选择课外补习的家庭子女所在学校重点级别设为五级，分别是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重点和非重点。数值越大表示重点级别越高。

在描述性统计中，首先删除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为缺失值的家庭，即只保留子女就读中小学的家庭。[①] 笔者发现参与课外补习的家庭占比达到 40%，课外补习支出均值为 2058 元。公平感均值为 0.34，即仅有 34%的人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处于偏低水平；就风险偏好而言，只有 10%的人倾向风险偏好，这可能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谨慎、内敛的行事风格有关。从个人购买股票受周围人影响的

① 如果家中有 N 个子女（$N\geqslant 2$）均进行课外补习，则将其看作 N 个家庭处理。

占比为 68%，可见从众心理的集体主义特征较突出。本文样本中，61%为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占比较低。（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误
课外补习费用(元)	13217	2058	0	106000	6209
公平感	6953	0.34	0	1	0.47
风险偏好	13217	0.10	0	1	0.30
信用卡额度(元)	2076	41786	0	1030000	76635
买股票受别人影响	658	0.68	0	1	0.47
家庭收入(元)	12914	76899	0	18300000	226866
父母受教育年限(年)	12509	8.73	0	22	3.59
家庭儿童数(人)	13216	1.64	0	11	0.98
家庭总人口数(人)	13216	4.63	1	20	1.68
家庭依赖率	13216	0.47	0	1	0.18
户主女性	13210	0.45	0	1	0.50
户主年龄(岁)	13210	47.4	16	85	14.99
东部	13217	0.42	0	1	0.49
中部	13217	0.28	0	1	0.45
西部	13217	0.29	0	1	0.46
农村	13217	0.39	0	1	0.49
重点学校	11552	1.58	1	5	0.86

（三）回归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课外补习支出有大量的 0 值，即子女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为了保证能对这一部分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对课外补习支出加 1 后再进行对数处理。这样在保证对数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课外补习支出为 0 的家庭，但此时使用 OLS 得到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针对这种情况，在计量上需采用 Tobit 模型考察家庭文化价值观对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ln(y_i^*) = \beta_0 + \beta_1 \text{culture}_i + \beta_2 \text{Fami}_i + \beta_3 \text{School}_i + \text{eco}_i + u_i$$

$$y_i = \begin{cases} y_i^*, & y_i^* > 0 \\ 0, & y_i^* \leqslant 0 \end{cases}$$

其中，y_i^* 表示家庭 i 的课外补习支出的观测值，y_i 表示真实的课外补习支出。当 $y_i^* > 0$ 时，课外补习支出的真实值就是 y_i^*；当 $y_i^* \leqslant 0$ 时，此时家庭没有课外补习支出，实际课外补习值为 0。culture_i 是本文关注的家庭文化价值观维度变量，分别有权力距离（公平感）、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个人与集体主义（从众心理）、长期与短期导向（时间偏好）。Fami_i 为家庭 i 的家庭和户主特征变

量，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儿童数、家庭依赖率、户主性别、户主年龄。$School_i$ 为重点学校变量。eco_i 表示经济变量，包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农村虚拟变量以及县级 GDP。u_i 为误差项。

五、实 证 结 果

（一）基本结果

1. 权力距离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 1，在该维度分析中，本文使用公平感衡量权力距离，且权力距离越大，公平感越强。通过建立 Tobit 模型，在控制所有变量，如家庭收入、父母学历、家庭人口结构、学校变量、地区以及县级 GDP，笔者发现公平感的系数为 0.223，且在 5%水平下显著，表明相较于公平感弱的文化价值观，公平感强的家庭对其子女课外补习支出高出 22.3 个百分点，这意味公平感强的家庭的影子教育投入会更高。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公平感强反映了权力距离大，说明能够坦然接受社会公平现状的家庭会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如加大对其子女的影子教育投入等方式）来改变现状。（见表 3）

表 3 权力距离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权力距离（公平感）	0.078	0.106	0.190*	0.223**
	(0.75)	(1.03)	(1.77)	(1.97)
家庭收入	0.346***	0.350***	0.327***	0.337***
	(9.25)	(9.38)	(8.25)	(7.86)
农村	−1.930***	−1.650***	−1.542***	−1.523***
	(−16.59)	(−14.10)	(−12.21)	(−11.39)
父母受教育年限	0.227***	0.188***	0.177***	0.154***
	(15.13)	(12.55)	(11.26)	(9.17)
户主女性	0.286***	0.431***	0.508***	0.534***
	(2.97)	(4.48)	(5.08)	(5.04)
户主年龄	−0.013	−0.024**	−0.027**	−0.034***
	(−1.36)	(−2.44)	(−2.55)	(−2.98)
家庭儿童数		−0.641***	−0.621***	−0.609***
		(−6.96)	(−6.39)	(−5.86)
家庭人口数		−0.171***	−0.155***	−0.147***
		(−3.97)	(−3.41)	(−3.02)

（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家庭依赖率		0.628*	0.553	0.473
		(1.70)	(1.42)	(1.15)
学校重点级别				0.286***
				(4.66)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241	6240	5698	4945
Pseudo R^2	0.054	0.062	0.070	0.074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2. 不确定性规避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对应假设 2，本文使用风险偏好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不确定性规避。由回归模型分析可发现，相较于低风险偏好家庭而言，高风险偏好家庭的课外补习支出高出 28.1 个百分点，且在 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家庭风险偏好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风险偏好越高，其影子教育投入也越高。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高风险偏好意味着更少规避不确定性，许多家庭对影子教育“趋之若鹜”，并非无意规避风险，而是影子教育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使得具有高风险偏好的家庭更期望通过增加影子教育支出来获得高回报。（见表 4）

表 4　不确定性规避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	0.250**	0.241**	0.270**	0.281**
	(2.28)	(2.21)	(2.38)	(2.33)
家庭收入	0.349***	0.364***	0.327***	0.323***
	(12.68)	(13.26)	(11.31)	(10.53)
农村	−1.671***	−1.379***	−1.184***	−1.144***
	(−19.72)	(−16.16)	(−12.84)	(−11.76)
父母受教育年限	0.248***	0.207***	0.197***	0.180***
	(22.14)	(18.39)	(16.62)	(14.19)
户主女性	0.272***	0.397***	0.409***	0.403***
	(3.86)	(5.66)	(5.59)	(5.23)
户主年龄	−0.016**	−0.026***	−0.030***	−0.038***
	(−2.25)	(−3.57)	(−3.83)	(−4.43)

（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家庭儿童数		−0.518***	−0.473***	−0.432***
		(−7.75)	(−6.74)	(−5.77)
家庭人口数		−0.222***	−0.214***	−0.214***
		(−7.05)	(−6.45)	(−6.06)
家庭依赖率		0.717***	0.589**	0.488
		(2.65)	(2.08)	(1.62)
学校重点级别				0.364***
				(8.21)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794	11793	10797	9466
Pseudo R^2	0.054	0.061	0.065	0.07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3. 集体主义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 3，本文使用从众心理来衡量集体主义。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众心理强的家庭相较于从众心理弱的家庭，会在 5%水平上显著增加课外补习支出 89.9 个百分点，这说明了从众心理对影子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分析，在我国集体主义的文化认知下，家庭集体主义价值观均较为突出，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较大。（见表 5）

表 5 集体主义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集体主义（从众心理）	0.843**	0.817**	0.899**	0.899**
	(2.12)	(2.07)	(2.06)	(2.06)
家庭收入	0.503***	0.552***	0.468***	0.564***
	(2.98)	(3.24)	(2.67)	(2.98)
农村	−8.288***	−7.845***	−7.814***	−6.622***
	(−3.76)	(−3.61)	(−3.62)	(−2.81)
父母受教育年限	0.207**	0.209***	0.196**	0.175**
	(3.19)	(3.07)	(2.74)	(2.23)
户主女性	0.129	0.136	0.142	0.338
	(0.35)	(0.37)	(0.37)	(0.82)

（续表）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户主年龄	−0.155**	−0.138**	−0.126**	−0.147**
	(−3.25)	(−2.88)	(−2.50)	(−2.57)
家庭儿童数		0.259	0.291	0.400
		(0.56)	(0.61)	(0.76)
家庭人口数		−0.568***	−0.682***	−0.760***
		(−2.35)	(−2.72)	(−2.84)
家庭依赖率		4.162**	3.939**	3.324
		(2.28)	(2.09)	(1.61)
学校重点级别				0.248
				(1.28)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42	642	604	510
Pseudo R^2	0.022	0.025	0.026	0.027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4. 短期导向对影子教育投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信用卡使用额度来衡量时间偏好，时间偏好越强表示偏向短期导向，以此验证假设 4。回归分析发现，同样在控制其他所有变量的情况下，受访人信用卡使用额度每增加 1%，影子教育投入提高 29.7 个百分点，且在 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倾向于短期导向（时间偏好越强）的家庭会增大对其影子教育的投入。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看，时间偏好强和侧重当下消费指向“短期导向”的文化价值观，这也充分证实了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目的，即在短时间内实现课外补习的“培优”或“补差”，而非是教育投入的“长期策略”。（见表 6）

另外，其他家庭变量检验与已有相关研究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家庭收入越高其对影子教育的投入越多；农村家庭相较于城镇家庭具有更低的影子教育投入；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对影子教育投入也越高；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有更高的课外补习支出；户主年龄越低也越容易接受较高的影子教育投入，这说明随着家庭对其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年轻人或许更愿意选择影子教育；家庭依赖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家庭负担情况，本文中家庭依赖率对课外补习支出影响不显著。但从经验上判断，家庭负担越重，对其子女的教育支出应该越低。不显著的实证结果可能与家庭依赖率（即家庭没有工作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使用人口结构衡量方式有关，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不如家庭收入直观。

表 6 短期导向对影子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1)	(2)	(3)	(4)
短期导向(信用卡额度)	0.408***	0.436***	0.336***	0.297***
	(4.63)	(4.97)	(3.66)	(3.05)
家庭收入	0.395***	0.431***	0.413***	0.402***
	(4.57)	(5.00)	(4.69)	(4.19)
农村	−2.858***	−2.489***	−2.378***	−2.634***
	(−6.33)	(−5.47)	(−5.04)	(−5.20)
父母受教育年限	0.309***	0.237***	0.236***	0.242***
	(9.01)	(6.49)	(6.26)	(5.93)
户主女性	0.811***	0.898***	0.918***	0.950***
	(3.94)	(4.38)	(4.35)	(4.23)
户主年龄	−0.054**	−0.064**	−0.064**	−0.092***
	(−2.19)	(−2.49)	(−2.41)	(−3.04)
家庭儿童数		−0.647***	−0.592**	−0.571**
		(−2.70)	(−2.36)	(−2.08)
家庭人口数		−0.474***	−0.413***	−0.451***
		(−4.17)	(−3.46)	(−3.55)
家庭依赖率		3.150***	2.692***	2.781**
		(3.29)	(2.66)	(2.55)
学校重点级别				0.158
				(1.39)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 GDP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89	1988	1865	1622
Pseudo R^2	0.032	0.037	0.038	0.041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二)进一步探讨

1. 影子教育投入的特殊性

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为一种家庭教育投入,这一“影响”究竟是“一般”还是“特殊”,有必要从家庭教育总支出进行逐层对比剖析。家庭教育总支出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主要指

在职教育培训，这里称为“投己”；[①]另一类是包括影子教育在内的子女教育支出，称为“投子”。除此之外，子女教育支出包括常规性的学校教育支出，称为“学杂费”；还有非常规性教育支出，如“择校费”。基于以上分类，本文首先考察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家庭“总投入”“投己”和“投子”三个因变量的影响情况，通过回归分析可知：(1) 从“总投入”看，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维度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2) 从“投己”看，没有一个维度表现出显著影响，这或许是因为父母在职教育培训往往是其职业发展的“硬性”要求，文化价值观影响较弱；(3) 从“投子”看，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从众心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上文影子教育的作用方向一致，但公平感无显著影响，笔者推测这可能与子女进行影子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学校教育)投入干扰有关。(见表 7)

表 7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家庭不同类型教育支出的回归结果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总投入	样本量	投己	样本量	投子	样本量
权力距离	−0.019	2950	0.056	2949	−0.035	2950
(公平感)	(−0.39)		(0.80)		(−0.67)	
不确定性规避	0.129**	5700	0.015	5698	0.142**	5700
(风险偏好)	(2.44)		(0.22)		(2.54)	
集体主义	0.176	422	0.347	422	0.222*	422
(从众心理)	(1.62)		(1.10)		(1.89)	
短期导向	0.088***	1220	0.072	1220	0.071**	1220
(时间偏好)	(3.20)		(1.06)		(2.28)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子女其他教育投入，即学杂费和择校费进行对比验证。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其子女选择影子教育的影响与其他两类教育存在明显差异：(1)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子女其他两类教育投入的影响均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学杂费的“规定性”和择校费的“高成本性”或“高门槛性”有关，文化价值观很难对以上两类教育投入造成影响和干扰；(2) 从学杂费来看，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中仅有风险偏好对其有 5% 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②]这说明随着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结束，继续接受教育的学杂费投入增加，伴随的风险也就越高，再次证实了我国家庭微观教育决策中不规避风险的“高风险、高回报”倾向。(如表 8)

① 父母自身教育投入＝家庭总教育投入－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其中三世同堂住在一起的家庭，父母自身教育投入还包括对祖辈的教育投入。由于三代人一起住的家庭相对较少，爷爷奶奶辈所需的教育支出也很少，本文姑且将“家庭总教育投入”与“子女的教育投入”的差值看作“父母自身的教育投入”。

② 学杂费支出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相对较低，但是高中教育阶段，包括民办高中的学杂费相对较高，对这一维度的整体考量有直接影响，本文未做区分。

表 8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子女学杂费和择校费的回归结果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学杂费	样本量	择校费	样本量
权力距离	−0.136	4602	−0.374	284
（公平感）	（−1.44）		（−0.59）	
不确定性规避	0.213**	8799	0.361	515
（风险偏好）	（2.02）		（0.64）	
集体主义	0.041	500	−0.282	66
（从众心理）	（0.12）		（−0.26）	
短期导向	−0.115	1555	−0.047	162
（时间偏好）	（−1.57）		（−0.16）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一般而言，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与对子女的整个教育投入和家庭的教育总投入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显著性。然而，通过比较研究又可以看到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影响更富有特殊性。一是从“投己”与“投子”来看，显然家庭更倾向于将“额外”的教育费用投向子女，这一主观选择反映出父母对其子女寄予厚望；二是从“择教”与“择校”来看，当笔者将学校教育的学杂费视为一项常规性支出时，子女教育投入主要表现在“择教”与“择校”的衡量。“择教”主要指向校外的影子教育，是家庭为满足其子女教育的特殊化需求的选择，该行为体现为一种相对自由的市场逻辑；“择校”一般围绕正规的学校教育，是家庭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主要途径是支付择校费，该行为反映出行政规制下的“越轨”逻辑。因此，由于“择校”行为成本更高、操作更难，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看，这为家庭选择影子教育找到了合理解释。

2. 影子教育类型的差异性

马克·贝磊在对影子教育进行概念界定时指出，影子教育面向语言、数学或其他纳入考试范围的学术类科目，而非绘画、音乐、体育等非学术类科目。[73] 然而，国内学者薛海平则是把两种类型均视为影子教育，但在分析时采取分类研究的办法。[74-75] 为了深入考察影子教育不同类型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差异性，笔者亦把课外补习支出分为“学科类”和“艺体类”。回归分析发现，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两类课外补习影响差异较大。其中，公平感和从众心理越强的家庭，对其子女在学科类的课外补习支出越高，且分别在 10%和 5%水平上显著，说明父母认为学科类补习更强调子女自身努力，这类补习甚至对子女今后上什么样的大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这类补习竞争大，通常会伴随较强的从众心理；偏好风险和具有短期导向的家庭则更倾向艺体类课外补习支出，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显然，艺体类补习不同于学科类，相对周期短且较集中，是一种技艺性和素养性培养。一般来说，这类补习费用高、专业性强、出头难，再加之学校教育课业压力，可以说是一类高风险的教育投入。总之，本文从文

化维度同样证实了两类课外补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见表 9)

表 9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对不同类型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学科类	样本量	艺体类	样本量
权力距离	0.164*	4922	0.006	4918
(公平感)	(1.73)		(0.08)	
不确定性规避	0.130	9424	0.227***	9422
(风险偏好)	(1.11)		(3.15)	
集体主义	1.230**	504	−0.116	506
(从众心理)	(2.58)		(−0.32)	
短期导向	0.140	1610	0.216***	1612
(时间偏好)	(1.41)		(2.63)	

注：*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六、结论与思考

综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对影子教育选择不仅受制于多重“硬性”的家庭资本，而且还受控于“软性”的文化价值观及认知因素，但这些因素又常常是被遮蔽的、被人们忽略的。基于这一视角，本文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察影子教育需求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向度，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行为。就这一研究结论，本文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和思考。

其一，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努力学习”仍是当前家庭教育的主流观念，权力距离大和公平感强的价值导向，深刻体现在家庭对教育选择行为的社会认知——“追赶”与“卓越”，这就是为什么课外补习市场中存在许多超前学习和“抢跑”现象，培优型的精英教育价值观在我国社会文化场域中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这无疑会使中国家庭及其子女在求学路途上负思想之重而艰难前行。

其二，教育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因此教育投入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但面对这些风险，家庭在选择上仍表现出对教育的“执念”，并非规避其不确定性，反而是“加码”投入。显然，当前我国家庭对其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已经陷入了“异化”的境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三，长期的集体性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家庭微观教育决策不仅缺乏独立思考，而且还有一种“唯学历”的崇尚情结，特别是在影子教育过度市场化的牵引下，许多家庭容易产生“投机”心理，而这一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源于从众心理带来的压力知觉，严重影响家庭的理性选择，针对家庭教育决策失灵应引入家庭元治理。

其四，正是由于影子教育市场的内在价值是“效率第一”，所以才迎合了考试制度引发的“应试教育”之需，而这一需求往往是当下的、短期的，与素质教育

发展形成鲜明的逻辑反差，致使影子教育功能不断异化，可以说这是家庭对教育规律缺乏准确认识的表现，也无形中滋长了子女在求学中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

其五，影子教育投入是一种特殊的家庭教育消费，它不同于正规的学校教育或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正是因为其补充性和非强制性特性，使家庭的选择空间较大，这意味着制约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因素也相对集中，给家庭带来了许多选择上的障碍，特别是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其选择产生了难以忽略的影响。

总的来说，家庭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多元而复杂，它不像家庭资本（如：家庭经济状况等）那么难以改变，完全可以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进行调和。“外部影响”主要来自政府和学校，政府不仅要从影子教育的供给角度加以规范治理，还应该从家庭需求的角度，继续优化考试选拔制度和具体机制，进一步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加大对弱势群体家庭的支持，进而通过制度改革影响家庭文化认知；学校则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共角色，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提供对入学子女的学业评价、课外补习指导与咨询等服务，促进跨家庭的文化交流，发挥制衡过度课外补习的积极作用。

“自身建设”指向家庭的“元治理”，家庭（主要指父母）应配合“外部影响”的正向干预，正确理解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的文化精髓，如：突出集体利益，克服盲目从众和攀比心理；强调风险意识，抑制教育“投机”行为；尊重育人的周期性规律等，逐渐养成成熟、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减少文化传承的“变异”和“扭曲”。在此基础上，内化素质教育理念，即从观念层面重构文化价值观，通过对素质教育的深入认识，遵循青少年成长教育规律，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方面培养子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 梁晨，张浩，李中清.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3]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郑若玲，陈为峰. 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47—154.

[5]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R]. 北京：中国教育学会，2016.

[6]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R]. 中国教育财政，2018(2—3).

[7] 谢爱磊，洪岩璧. 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综述与评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1)：21—30.

[8] De Silva, W. A., Gunawardene, C., Jayaweera, S., Perera, L., Rupasinghe, S., &Wijetunge, S. (1991). *Extra—school instruction, social equity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SriLank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9] Marimuthu, T., Singh. J. S., Ahmad, K., Lim, H. K., Mukherjee, H., Osman, S., et al. (1991). *Extra—school instruction, social equity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in Malaysi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10][19] Stevenson, D. L., & Baker, D. P. (1992).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6), 1639—1657.

[11][20] Bray, M. (1999).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Series*, 61.

[12] 〔美〕马克·贝磊. 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 [M]. 杨慧娟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9.

[13][16] 翁秋怡. "影子教育"研究述评:需求、效果及公平性讨论 [J]. 教育经济评论,2017(3):115—128.

[14] Baker, D. P., Akiba, M., LeTendre, G. K., & Wiseman, A. W. (2001). Worldwide shadow education: Outside-schooling learn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schooling, and crossnationa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3*, 1—17.

[15] Bray, M., Mazawi, A. E., & Sultana, R. G. (Eds.)(2013). *Private tutoring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Power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and equity*. Rotterdam: Sense.

[17] 澎湃. "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 [J]. 比较教育研究,2008(1):61—65.

[18] 钟秉林. 扎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J]. 教育研究,2018(10):14—21.

[21] Salili, F. (2005). Accept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In D. A. Watkins & J. B. Biggs (Eds.),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pp. 85—185).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2] Kim, K. (2010).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 J. Lee, S. Kim, & D. Adams (Eds), *Sixty years of Korean education* (pp. 285—325).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3] Aurini, J., Davies, S., & Dierkes, J. (2013) Out of the shadows?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wide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J. Aurini, S. DAVIES, & J. Dierkes, Out of the Shadows: The global intensification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pp. xv—xxiv.

[24][73] 〔美〕马克·贝磊,刘钧燕. 课外补习研究:问题与方法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7):2—16.

[25]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J]. 中国社会科学,2003(4):86—98.

[26] 蒋国河,闫广芬. 城乡家庭资本与子女的学业成就 [J]. 教育科学,2006(04):26—30.

[27][28][74] 薛海平,李静. 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 [J]. 教育经济评论,2016(11):60—79.

[29] Bray, M., Zhan, S., Lykins, C., Wang, D., & Kwok, O. (2014). Differentiated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educati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8* (1), 24—37.

[30] Tansel, A., Bircan Bodur, F. (2007).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Turkey recent evidence on its various aspect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9* (1), 162—17.

[31] 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 [J].教育研究,2009(01):39—46.

[32] Silova, I. (2010). Private tutoring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Policy choices and implication. *Compare*, *40*(3), 327—344.

[33] 刘洁,陈宝峰.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价值观影响 [J].中国农村观察,2007(6):27—36.

[34] Goodman, A., Gregg, P. A., & Washbrook, E. V. (2011).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aspira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through childhood in the UK. *Longitudinal and Life Course Studies*, *2*(1), 1—18.

[35] 余丽甜,詹宇波.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J].财经研究,2018(08):62—74.

[36] 丁从明,邵敏敏,梁甄桥.宗族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95—108.

[37] Hannum, E. (2003). Poverty and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Villages, households, and girls' and boys' enrollment.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7* (2), 141—159.

[38] 〔荷〕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 [M]. 李原,孙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29.

[39][62] Hofstede, G. (1980).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0*(4), 15—41.

[40][42] Kirkman, B. L., Lowe, K. B., & Gibson, C. B. (2006). A quarter century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corporating Hofstede's cultural values framewor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3), 285—320.

[41] Yoo, B., & Douthu, N. (2002). The effects of marketing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cultural values on marketing ethics of students.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4* (2), 92—103.

[43] 占德干,张炳林.企业文化构建的实证性研究——对四个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与分析 [J].管理世界,1996(5):204—23.

[44] Jansen, E. P., Merchant, K. A., & Van der Stede, W. A. (2009).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centive compensation practices: The differing role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 *34*(1), 58—84.

[45]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46] 廖梦帆.高/低语境文化与权力距离对中美学生选择与老师交流媒体的影响[D].重庆:重庆大学,2011.

[47][67] 吴薇.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8—96,93—94.

[48] 黄河.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维度在中国地域文化中表现度的实证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4,16—17.

[49][53][63][65][66] Hofstede,G.(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Sage, 359,98,161,225,259—360.

[50] 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A].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M].1992:34.

[51] 郑伯埙,黄国隆.相似或相异:海峡两岸组织文化之比较[J].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1999(11):3—58.

[52] 强铭.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浅析中美家庭教育[J].科协论坛,2011(9):152—153.

[54] 段锦云,王重鸣,钟建安.大五和组织公平感对进谏行为的影响研究[J].心理科学,2007(01):19—22.

[55] 翁定军.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J].社会学研究,2010(1):85—110.

[56] 夏向东.低收入群体心理焦虑的原因探求[J].社会工作,2009(24):56—58.

[57] 熊青.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状况[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5):695—697.

[58] 朱志玲,朱力.从"不公"到"怨恨":情绪的形成逻辑社会怨恨[J].社会科学战线,2014(2).

[59] Pibnes, A., Aronson, E., & Kafry, D.(1981). *Burnout: From tedium to personal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60] 王希永.中学生学习焦虑及其并发症[J].青年研究,2000(2):30—33.

[61] 王玉兰.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和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0(7):20—24.

[64] 王蓉.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10.

[68] 孙伦轩,唐晶晶.课外补习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估计[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123—141.

[69] 人民网."影子教育"盛行的背后是教育恐慌[EB/OL]. 2012-07-31,http://edu.people.com.cn/n/2012/0731/c1006-18634419.html.

[70] 叶德珠.基于时间偏好不一致的信用卡利率结构设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08):134—142.

[71] Shane Frederick, G. L.(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2), 351—401.

[72] Meier, S., & Sprenger, C.(2010). Present-biased preferences and credit card borrowing.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1),193—210.

[75] 薛海平.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J].教育与经济,2016(02):32—43.

附录

表 1 家庭人口结构相关性检验

	家庭儿童数	家庭人口数	家庭依赖率
家庭儿童数	1.0000		
家庭人口数	0.7056***	1.0000	
家庭依赖率	0.2429***	−0.0047	1.0000

注：* $p<0.1$，** $p<0.05$，*** $p<0.01$。

表 2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课外补习支出(去掉家庭儿童数)

	因变量:课外补习支出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权力距离(公平感)	0.253**			
	(2.23)			
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		0.263**		
		(2.18)		
集体主义(从众心理)			0.911**	
			(2.08)	
短期导向(时间偏好)				0.283***
				(2.92)
家庭收入	0.343***	0.328***	0.404***	0.336***
	(8.03)	(10.70)	(4.21)	(3.56)
农村	−1.511***	−1.140***	−2.584***	−1.134***
	(−11.30)	(−11.72)	(−5.10)	(−11.51)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66***	0.188***	0.267***	0.187***
	(9.89)	(14.94)	(6.81)	(14.60)
户主女性	0.459***	0.355***	0.906***	0.344***
	(4.36)	(4.63)	(4.05)	(4.44)
户主年龄	−0.028**	−0.033***	−0.085***	−0.030***
	(−2.48)	(−3.82)	(−2.82)	(−3.47)
家庭人口数	−0.283**	−0.316***	−0.545***	−0.316***
	(−6.64)	(−10.30)	(−4.62)	(−10.22)
家庭依赖率	−0.625*	−0.259	1.828*	−0.276
	(−1.69)	(−0.95)	(1.85)	(−1.00)
学校重点级别	0.293***	0.367***	0.166	0.359***
	(4.76)	(8.27)	(1.45)	(8.01)
样本量	4945	9466	1622	9270

注：模型中去除了家庭儿童数；* $p<0.1$，** $p<0.05$，*** $p<0.01$；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责任编辑 范皑皑)